

《天路历程》与《西游记》之平行比较

陈明洁

(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人文系 浙江 杭州 311112)

摘要 被西方认为最好的少年启蒙读物《天路历程》与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同以宗教取材,分别成功地塑造了中西方的古代神话世界。本文试图从文中主人公的出行动因、作者对待新兴阶级的态度和创作动机等方面,从深层次上探究两部小说之间的差异,以加深读者对两部经典著作的认识。

关键词 《天路历程》《西游记》;比较;差异

中图分类号:J1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4970(2006)03-0067-03

《天路历程》与《西游记》同以宗教取材,同样塑造了一个作者理想化的主人公,在艰苦卓绝的天路上排除万难,奋勇向前,直到走到理想中的天国为止,表现了不论遇到多少艰难险阻,都要一往无前、不屈不挠地坚持下去的精神。《天路历程》被西方人誉为“最完美的寓言作品”,《西游记》是“中国中世纪的神话”,它们都截取出世的题材,却又针砭时弊,体现出深刻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呈现出入世的思想。况且《天路历程》在中国又被译为《圣游记》,而《西游记》,据英国人海伦·海斯(Helen Hayes)的翻译,又定名为《the Buddhist Pilgrim's Progress: the Record of the Journey to the Western Paradise》,这两部小说书名中英文翻译的细节类似说明了中西方的学者早就看到了两者之间的相同之处,并将他们对照考虑了。尽管如此,两部作品在出行动因、对待新兴阶级的态度和文法特点等方面存在天壤之别。揭开隐藏在表面相似之处深层次的相异之处,有助于加深我们对两部经典著作的认识。

《西游记》是中国古典四大名著之一。在中国,该小说塑造的孙悟空、猪八戒等人物形象无论是男女老少还是白丁鸿儒均可对其讲出个子丑寅卯来,它所描写的“大闹天宫”、“三打白骨精”、“三借芭蕉扇”等故事情节也都家喻户晓。《西游记》的故事原型取自公元7世纪玄奘法师不畏艰险、为求真经奋力西行的真实题材,它经过历代文人雅士的创作改编,最终在明嘉靖(公元1522~1567年)年间由一民间人士定型。

《天路历程》是17世纪英国文艺复兴后期著名

作家约翰·班扬的经典之作,被誉为“具有永恒意义的百科全书”,是英国文学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该作品为英语文学的大众化、通俗化和口语化以及英语语言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在国外,它几乎是人人必读的作品,并被认为是最好的少年启蒙读物。因它的性质、题材的限制,该书很少出现在中国学者所撰之西方文学史专著上。《天路历程》分为两部。第一部描写一个居住在“毁灭城”的基督徒为了“逃避将来的天罚”而听从宣道师的教诲,向锡安山(耶路撒冷)前行,排除万难,坚忍不屈,终于走到天堂之门的故事。第二部讲的是几年后基督徒的妻子带着四个孩子跟随丈夫的足迹再走天路的故事。该书作者是英国近代小说家、清教徒约翰·班扬(John Bunyan, 1628~1688)。在西方班扬与弥尔顿(John Milton, 1608~1674)并称为“清教徒作家中的双子星”。《天路历程》在西方的发行量仅次于《圣经》,被译为122种语言,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西方人。1853年(咸丰三年),英国传教士宾威廉将《天路历程》翻译成中文,这是中译外国文学的滥觞。

一、主人公出行原因不同

《西游记》和《天路历程》都是以宗教的题材表现现实的思想,但两者对于宗教的态度、理解却是天差地别,这从两部作品的主人公出行的原因即可见一斑。

《西游记》取材于佛教题材,所描写的也是佛教中的人物,但它却不是一部为佛教伸张的作品。按鲁迅的说法:“全书仅偶见五行生克之常谈,尤未学

佛^[1]。也就是说《西游记》是一部颠覆之作。它对于中国古代封建思想文化、对于森严的儒道释思想都是一种酣畅淋漓的讽喻。所谓的“唐僧取经”的佛家故事以及故事中使用的一系列佛道语素,不过是作者表现自我情感与思想内涵的平台而已。

《西游记》是一部“游戏之作”,其中含有“尖刻的现实主义”,在“游戏之中暗传密谛^[2]”。体现在《西游记》中的是作者用游戏的笔调写出的对现实封建社会的不满。明朝中后期,皇帝一个比一个昏庸,朝政黑暗,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世风日下,道德败坏。在这种情势下,“拯救”与“忠君爱国”的思想,便是作者极力提倡的。唐僧的西天取经,不是为了个人的荣辱,而是为“拯救芸芸众生”和“法轮回转皇图永固”。拯救什么?就是拯救他们濒临灭亡的丑恶灵魂,拯救这个日渐衰朽的没落时代,拯救日益失落的道德思想和文明。唐朝所在的“南瞻部洲”,是一个“多贪多杀,多淫多诞,多欺多诈”、“不忠不孝,不义不仁,瞒心昧己,大斗小称,害命杀牲,造下无边之孽,罪盈恶满,致有地狱之灾”的地方^{[3]395}。很明显,这和那个煌煌大唐的局面完全不符,由此可见作者只是借唐代这一载体,表现的却是明朝中后期世风日下,物欲横流的局面。作者如果是生在民国时代,定会学那叶挺,“把那活棺材和我一起烧掉”。但时代造就了人,时代也限制了人,作者毕竟不是革命者,企望着毁灭旧时代,再造新时代。他想的方法是“改良”,即利用好的思想,好的道德修行来改变这一危势,拯救人们的心灵。因为这个原因,唐僧出发了,去求那真经。那些个真经,在作者的眼中,已是救国救世的良方了。尽管在实际历史中,那几卷经书所起的作用是极其有限的。不仅仅是那些经书,唐僧西行的这一路上,就是在不断地拯救中度过的。好好回味一下唐僧与孙悟空对于几个昏君的劝导与批评,这些话也就代表了作者对于封建统治阶级的拯救:只有听从他们的教诲,才能保证你们“海晏河清千代胜,风调雨顺万方安^{[3]304}”,作者的本意并不是想让皇帝下台,而是企望皇帝能自我救赎灵魂,从而达到巩固统治兴盛国家的目的。

至于“忠君爱国”思想,作者不像“拯救众生”那样遮遮掩掩,而是直截了当:唐太宗刚问完谁愿去,唐僧便转身而出,说:“贫僧不才,愿效犬马之劳,与陛下求取真经,祈保我王江山永固。^{[3]35}”后来又说:“这一去,定要到西天,见佛求经,使我们法轮回转,愿圣主皇图永固。^{[3]36}”这就彻底改变了唐僧在历史上求取真经的真正目的。玄奘法师西行,是为了弘我佛法,普度众生;唐僧西行,却是为了保佑我皇。他已几成唐皇“天竺国雷音寺朝圣”的替身了,整个

蜕变成为儒家的入世精神。由于唐太宗的知遇之恩,使得每每唐僧遇难时,心中的支柱除了“西见我佛,求取真经”之外,便是“不负我皇大德大恩”。这就体现了一个很有趣的现象:作者将现实生活写得丑恶不堪,却不要人们来毁灭它,因为皇帝是无辜的,皇帝是被蒙蔽的,所以人们还是应该忠于皇帝,要做的就是像孙悟空那样,把遮掩在皇帝眼前的浓雾化去。看得真切的封建统治者,就会像唐太宗那样,成为有道明君,人们也可安居乐业。今人可以说这是作者的局限性,但在当时那样一个历史条件下,没有这种局限倒反而是咄咄怪事。

《天路历程》写的是《圣经》题材,班扬想的不是像《西游记》作者那样,去颠覆它,而是借此去发扬它,光大它。班扬的时代,英国皇帝仍是罗马天主教的信徒,而当时基督教会腐化严重,横征暴敛,大肆搜刮,荒淫无度,完全没有《圣经》中所教诲的那般诚信持礼、俭朴爱人的思想。班扬的工作,便是用他的笔,把这种颠倒的世事纠正过来。作者不需用什么大道理,因为作者以为世事之所以堕落,是因为他们把老祖宗的教诲给忘了,用的办法便是强调和重申《圣经》的思想。基督徒的天路旅行是出于什么原因?是因为他“被身上背负的重担压得喘不过气”,担心所居住的地方将会被琉璃火毁灭,所以大声地哭泣:“我怎么才能得救呢?^{[4]3}”。基督徒知道自己的罪行,却因为“怕这个在我背上的重负会把我压得沉到比坟墓更深的地方去,坠到地狱里去。^{[4]3}”而不愿死,“祈望‘逃避将来的天罚’”^{[4]3}。可见,基督徒明晓自己身上所犯的罪行,有着自我救赎的原罪思想。为此,宣道师赐予了他一本《圣经》,告诉了他通往灵魂天门的路。他去天门干什么呢?是去要“生命!生命!永恒的生命!^{[4]3}”,是想得到“荣耀的冠冕”、“发亮的衣服^{[4]3}”等等。基督徒不是为了众人的救赎而去的,纯粹是为了自我的幸福,自我的解脱。而且,为了表示他的救赎的决心和坚贞,他主动地迫不及待地与过去一刀两断。一路上他几乎没有提及自己的家乡没有想念家中的弱妻和幼儿。他的理由是“我羡慕的乃是一个更美的家乡,那就是在天上的^{[4]3}”。即使是进了天堂,“和许多神仙在一起”时,也没有一丝一毫衣锦还乡的意思。然而又不能不说基督徒是个无情无欲的人,他对于行的“忠信”和“盼望”的关心,也是显而易见的。因为他们支持他的想法,并甘愿和他并肩而行。可见,班扬心目中的基督徒形象,是非常纯粹的。他一定要有自我救赎的心理,一定要意识到自己的罪过,并且敢于为了悔过而听从上帝(《圣经》)的教诲,接受上帝的历练,他的思想应该是“非此即彼”的,和他思想相通的,便是

自己的弟兄,与他思想相左的,即使是妻儿挚友,也尽可一一抛弃。班扬是借基督徒的出行,表明了他坚持《圣经》思想的决心以及对于反叛《圣经》的罗马教会的不满和批判:你们和我没有相通的思想,所以你们不是我的兄弟,不是耶稣的圣徒。班扬在此含蓄地对罗马教会和其爪牙英国教会进行了口诛笔伐,同时又暗示说,只要你们明白身负的罪孽,一样可以回到耶稣门徒的行列中。这又给罗马教会留了条后路。

一部是借宗教的题材写反叛的思想,一部是借宗教的题材发扬宗教思想。态度虽然不同,主旨却是很相似的,便是借一个理想人物的拯救和自我拯救的过程,含蓄地对世事进行了批判,同时希望统治者能够认清身上的罪过,改弦更张,再造盛世。至于救赎的方式不同,那是中外思想上的不同所致,实质则是殊途同归。《西游记》寄望于外力的拯救,《天路历程》祈望于个人自我的救赎。只要人人得到了自我救赎,不就达到了群体的拯救了吗?

二、对待新兴阶级的态度不同

《西游记》作于明末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天路历程》是写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时期。因此,在作者的笔下,都不可避免地涉及对新兴阶级的描绘。看看两位几乎同时代的作者对于新兴阶级的态度,也是饶有风趣的。

《西游记》写的是唐朝事情,然而一路上经过的诸多城市,却都有着明代中后期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带来的蓬勃发展的影子。作者对待这种传统意义上的“末业”是持一种谨慎的肯定。说是谨慎,因为作者没有直接提及商业的好处,也没有对此作大力宣扬,毕竟身处封建时代,作者还不敢直截了当地发出“兴商”的檄文。但作者的肯定却是事实。每过一处的都会,作者总会下一段赞语,更有将“热闹繁华”的酒楼歌馆的场景看作是“极乐世界”的象征。甚至在第48回唐僧在陈家庄见诸多买卖之人,不顾生死踏冰而行发出感慨道:“世间事惟名利最重。似他为了利,舍死忘生,我弟见奉旨全忠,也只是为名,与他能差几何!”把原本认为低贱的商业行为和崇高的取经行为等量齐观,这本身就是一种突破。同样,书中处处体现对人性的歌颂,对自由精神的向往。无论作者是否有意为之,孙悟空的形象本身就表现了希望能冲破旧的生产关系的桎梏,企望个性解放的思想。作者属于社会下层人士,对于资本主义新生产关系带来的飞跃有着切身的体会,所以才会书中大力地提倡和弘扬这种精神。写小说史的人,总把《西游记》和《金瓶梅》划分成两个时代。其实这是不

确切的。《西游记》在很大程度上是《金瓶梅》和它引导的世情小说的滥觞,两者在对待新兴阶级,对待新的时代精神,从本质上是相通的。我们读《西游记》,一点也不感觉隔阂,这也表明这种时代精神和今天的理念有其共通之处。

如果作品中没有“浮华集市(Vanity Fair)”的描写,《天路历程》就是一本纯粹的劝世的宗教作品。然而有了这段描写,作品的时代性一下子体现了出来。班扬笔下的“浮华集市”,是一个物欲横流、荒淫无度、道德卑下的地方。有钱可以买到任何东西,包括“国家、欲望、快乐以及各种享受,如娼妓、鸨母、丈夫、儿女……”^{[4]36}等,可以看到无赖、恶棍,可以一钱不花地看到偷窃、谋杀、通奸、假发誓的人,可谓“触目惊心”。基督徒和“忠信”买的却是“真理”,结果被冷嘲热讽,而后被围攻、被囚禁、被审判,“忠信”甚至因此而被杀害。这个“浮华集市”就是英国资产阶级贵族生活的象征。作者把它写得那样腐败,是否证明了作者反对资产阶级的思想呢?不是。班扬参加过克伦威尔的“新模范军”,受到过资产阶级思想的熏陶。他反对的不是资本主义,而是反对那些“反对至高的上帝的人”^{[4]36},也就是反对那些不遵上帝教诲荒淫的贵族老爷们,反对那些借圈地运动和生产方式改革大大搜刮的教会僧侣们。班扬对于新兴的阶级,持着一种肯定而批判的态度。基督徒对于物欲的渴望(永恒的生命、荣耀的冠冕等等),在追求自我幸福的过程中不畏艰险的精神,正是新兴资产阶级的写照。而在“忠信”批判“浮华集市”时,班扬也巧妙地偷换了一个概念,将他的矛头对准了他们的“不敬神”,而不是这个集市存在意义的本身,并且作者还在基督徒行路的后期给他加了一个从集市里出来名叫“盼望”的旅伴,并还说“许多人慢慢地都会跟着来的”^{[4]36},这本身就表明了班扬对于这个阶级的肯定。

东西方两位作者对于同一个阶级都持有一定的赞同态度。然而《西游记》的作者赞赏的只是资本主义带来的生产力发展这一现象,而对于其思想、缺陷等并未涉及,这是因为在明末资本主义还只是萌芽,还谈不上对其进行思想理论的总结,也并未暴露出多少阶级本身具有的受马克思批判的弱点。至于班扬,资本主义已经在他那个时代发展了一百多年了,他已经可以大体上对其进行中肯的评价。作者一方面肯定其对于生产力发展的巨大推动,另一方面又将其赤裸裸的物质主义本质暴露在人们的面前。班扬同样也企望,资产阶级能够在《圣经》思想的教诲下,洗脱一切尘垢,达到灵魂的升华。一个是谨慎的肯定,一个是肯定并批判之,皆因不同时代特征所致。(下转第91页)

径之一。在调查过程中,笔者观察到一个现象,就是虽然院领导开明、有思想,中层领导也有不少新的思路,但缺少的是有效的交流和沟通,以至于好的发展理念和工作思路无法得以贯通与发展,教师之间交流与合作的机会更有局限性。提倡组队工作,加强面对面的学术交流是符合桑恩得斯和布赫高尼提出的新的组织文化理念的,同时,它也是我们亟待解决的现实问题之一。

加强学术交流和提倡组队工作,目的是激励创造性的工作、研究和思维,激励平等自由的交流,让每个人的才智都能得以发挥和发展,和有效地发展组织共识等。我们要着重加强“科研组队”的交流。科研组或已结项的项目组,有义务将科研成果拿出来与大家共享,与外单位的合作性研究,可能的话也要有个汇报。在组队工作和与其他组队交流过程中,可提倡非正式的灵活组队和信息共享,要减小对等级和角色的关注,要以知识、贡献大小为权威,还要鼓励成员效忠于研究组队的共同的目标等。

(上接第 69 页)

三、作者的创作动机不同

从人物的塑造上,可以看出作者的创作态度。《西游记》和《天路历程》也不例外。

人们在谈论《西游记》时,大多是从其思想性、时代性的角度。以今人揣古人往往会南辕北辙。其实《西游记》的作者首先是想讲一个故事,通过故事自觉或不自觉地表现出自己的思想。因为小说在古代又能起到多大的社会效果呢?所以《西游记》首先是其故事性,思想性是随着故事的深入一点一点反映出来的。品读《西游记》,人们首先是被其有趣的故事所吸引,被其行文中浓重的喜剧气氛所感染,发出一次又一次会心的微笑。人们也会感觉它在骂人,但这并没有影响阅读者的趣味;相反,它在行文中冷不丁地刺人一下,让人还觉得很受用。板着脸孔骂人,那是老学究干的活,《西游记》最了不起的地方,就在于它深刻诠释了“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真谛。所以《西游记》的作者脑子里想的,首先是要把故事编得好看,不好看人家就不来捧场了。这就需要文字的通俗性、流畅性以及对人物的深刻的塑造。《西游记》中的人物塑造是中国古典小说中出类拔萃的。孙悟空、猪八戒、唐僧、沙和尚集中了世上芸芸众生的许多特点,均堪称是某一类人物的典型。孙悟空身上体现出的大无畏的英雄主义精神,猪八戒的那种小农主义思想,均刻画得栩栩如生。

最后应强调,所谓“文化”,不是一个平台、一个窗口,而是一种氛围,一种人同机构之间的心理契约和不成文的文化规则。要真正实现我们提出的杜绝权利文化,淡化角色文化,发展独特的有机性学习环境和支持与成就组织文化,及实现开放度、信任度与深度均高的交流氛围,将是一个相对长久的、缓慢的过程。同时,它又是一个十分必要的发展历程。因为,学习环境从机械的形式向有机的形式的转变,势在必行,而发展有中国特色的支持与成就组织文化,是我国教育机构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参考文献:

[1] GEERTZ C.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M]. New York: Basic Books, 1973.
[2] MURRAY S. A culture for change[J]. Journal of Computer Assisted, 1998(14): 169-181.
[4] ETIENNE W. Communities of practice-learning, meaning and identity[M]. [S. l.]: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9: 47-48.

与《西游记》相比,《天路历程》中的故事其本身并不精彩,它真正好看的是主人公和别人的辩论。我们发现《天路历程》中的所有人物、场景都虚设的符号,不过是将世间的抽象事理拟人化而已。所以班扬写《天路历程》时,他的脑中可能只有《圣经》中的一个又一个的道理,故事不过是他为了让别人更容易接受他的道理采取的手段罢了。基督徒是班扬心目中的理念型的清教徒形象,他所说的每一句话都代表了班扬对于人世与宗教理念的看法。在这点上和后来的笛福倒是相得益彰,后者的鲁宾孙是笛福心目中资产阶级的“形象大使”。而且,班扬为了把他的道理讲得更深刻些,采用了《圣经》中的某些句法结构特点,又夹带着一些口语化的句子,多采用短句的形式来加重语气,如“ So he did ”?“ That is it. ”之类的语句。这种类似于中国的“半文半白”的形式,却是英国散文从近代走向现代的成熟的标志。英语小说开始变得通俗而不再“之乎者也”了。在这个意义上,班扬的地位不次于中国的胡适之先生。后来的笛福、斯威夫特等便很受班扬的影响。

参考文献:

[1] 鲁迅. 中国小说史略[M]. 北京: 东方出版社, 1996: 132.
[2] 吴承恩. 李卓吾先生批评《西游记》[M]. 吉林: 吉林文史出版社, 2003.
[3] 吴承恩. 西游记[M]. 杭州: 浙江古籍出版社, 1993.
[4] 班扬. 天路历程[M]. 苏欲晓,译. 江苏: 南京译林出版社, 2002.